



法国新浪潮电影奠基者之一

永不“筋疲力尽”的戈达尔走了



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与全球网友线上互动

戈达尔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,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,他与全球网友在线上进行了一场直播。89岁的老爷子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直播里,穿着一件绿色毛织坎肩,里面穿一件细纹格子衬衣,下身穿驼色灯芯绒长裤,戴着黑框眼镜,手里夹一根大雪茄,依旧十足文艺范儿。

这场直播的主题是“冠状病毒时代的影像”。不过,一贯特立独行的老爷子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主题,这场直播就变成了一场闲言

碎语的漫谈,充斥着戈达尔个人生活、私人点滴和过往经历的回忆。

其实,对于观看直播的网友来说,高冷的戈达尔说什么并不重要(大部分网友也听不懂),在有生之年可以和“法国新浪潮主将”“电影史活化石”云见面,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。有网友统计,光是评论区留言的语言就多达12种,而有将近三分之一使用中文,可见中国影迷对其喜爱程度。

这场直播变成了影迷们的狂欢,有中国网友在淘宝上发现了戈达尔的同款绿色毛织坎肩,纷纷留言“买起”;也有很多网友对“法国新浪潮教母”阿涅斯·瓦尔达在纪录片《脸庞、村庄》中去拜访隐居在瑞士小城罗尔的戈达尔,却吃闭门羹一事耿耿于怀,留言:“为什么之前没有给阿涅斯·瓦尔达开门?”于是,戈达尔的侃侃而谈与网友们的评论形成一种有趣的错位,各聊各的,并且不亦乐乎。

从影评人到新浪潮旗手 上世纪60年代属于他

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出生于巴黎,父亲保罗·戈达尔是一名医生,母亲奥黛尔·莫诺德是瑞士一位牧师的后代,也是一位富有银行家的孙女,与法国诗人保罗·瓦莱里关系密切,后者的作品后来经常被戈达尔在电影中引用。

作为一个热爱运动的孩子,戈达尔喜欢足球、滑雪和篮球,后来又对网球产生了无限的热情。高中毕业后,他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,但经常逃课去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看电影,在那里他遇到了弗朗索瓦·特吕弗和雅克·里维特,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后来,他们三人,连同克劳德·夏布洛尔和埃里克·侯麦,开始为一份名为《电影公报》的杂志撰写评论文章。1952年,戈达尔加入安德烈·巴赞创办的《电影手册》,发表了第一篇回顾希区柯克的《火车怪客》(1951)的评论文章,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20世纪50年代批判性作品的基础,包括1956年那

篇影响深远的文章《蒙太奇,我的美丽忧虑》。

1952年,戈达尔暂停了影评写作,回到了瑞士,执导了短片《混凝土工程》,之后在瑞士电视台工作了一段时间,并在洛桑的一家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后,于1956年回到巴黎,在20世纪福斯公司做了两年的公关,为好莱坞在法国发行的影片撰写新闻材料。

1959年,戈达尔不用分镜头剧本,不租用摄影棚,甚至不采用人工光源,用藏在手推车中的摄影机拍摄了他的长片处女作《筋疲力尽》,该片成本极低,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,只拍摄了4周。由于戈达尔不断的质疑和情绪波动,这部电影的制作几乎变成了一场灾难。然而,该片在第二年上映时却引起了轰动,在柏林电影节拿下最佳导演银熊奖,也成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。与特吕弗的《四百击》(1959)、夏布洛尔的《漂亮的塞尔吉》(1958)一样,预示着一种

更年轻、更自由、更无礼的电影,与当时的大多数电影工作室的作品截然不同。电影史学家乔治·萨杜尔称赞戈达尔为绝对天才:“在技巧方面,还没有人能够如此老练地打破常规,戈达尔将电影语言的所有语法和影片的其他句法都付之一炬了。”

《筋疲力尽》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后,戈达尔在10年间拍摄了十几部故事片,尝试了不同的题材、风格和叙事形式。其中有音乐歌舞片《女人就是女人》(1961)、爱情悲剧《蔑视》(1963)、半喜剧的犯罪电影《法外之徒》(1964)、先锋科幻电影《阿尔法城》(1965)、浪漫惊悚片《狂人皮埃罗》(1965)、解构公路电影《周末》(1967)等。可以说,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是属于戈达尔的,他使电影现代化了。而在此期间,好莱坞也曾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,在导演阿瑟·佩恩接手之前,他差点与沃伦·比蒂合作执导《雌雄大盗》。

创造力上永不会“筋疲力尽” 晚年后“不喜欢听命”

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,戈达尔执导了近70部故事片、纪录片及电视作品。他的作品多次改变方向,从第一部向好莱坞叙事挑战,到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政治电影,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视频和碎片叙事的实验,再到90年代及以后的自传和历史蒙太奇电影。直到最后,戈达尔仍然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辩论家和电影革新者,用不倦的热情保持着自己的创作活力。

尤其是从《筋疲力尽》上映后的几十年里,他对世界各地的电影和电影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从巴西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日本,世界各地兴起的新浪潮很多都受他影响,包括几代好莱坞导演,马丁·斯科塞斯、布莱恩·德·

帕尔玛、保罗·施拉德、彼得·博格丹诺维奇,甚至鬼才导演昆汀·塔伦蒂诺自己工作室的名字“*A Band Apart*”便是源自戈达尔的电影《法外之徒》(Bande à part)。

事实上,戈达尔对电影的主要贡献可能是他的想法:电影既是它所讲述的故事,也是电影本身的故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戈达尔的所有电影都是关于电影的。

戈达尔在跳切、剪辑、片名卡片和不同拍摄形式方面的尝试,也对电影之外的媒体产生了重大影响,包括音乐视频和电视广告上的拼贴效果。如果戈达尔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挑战叙事和连续性的传统观念,这种拼贴效果可能就不会存在。

晚年的戈达尔更像一个隐

士,拒绝接受采访,拒绝领奖,也拒绝参加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大型活动。当他被授予法国国家功绩勋章时,他拒绝了:“我不喜欢听命,我也没有任何功绩”。

2010年,当他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,同样拒绝亲自前往洛杉矶领奖。他的伴侣安妮·玛丽·米埃维尔告诉媒体:“79岁的戈达尔不会去美国,他太老了,不适合做那种事。你愿意为了一块金属走那么远吗?”

在1995年的纪录片《自画像》中,戈达尔出现在银幕上,他在瑞士的家中沉思,漫步在日内瓦湖边,他说:“一幅图像之所以强烈,并不是因为它残酷或荒诞,而是因为它与思想的联系是遥远的,遥远且正确的。”据《新京报》